airiti

政大史粹第25期
2013年12月，頁83-106

「近世」由來之基：從宋代的「地域」、「地方統治」研究出發

小二田章*

本稿的「近世」論，是根據宋代地方統治和地域意識研究所做的再檢討。一般而言，將宋代視為「近世」或其萌芽的依據，是科舉制度的整備與浸透，以及連帶的士人階層之成立。本稿著重於士人地域意識的確立，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地方統治。

第一，有關地域研究，本稿敘述了日本、中國、台灣和歐美的研究動向與特徵。其次，舉出了若干**2008**年以降的共通傾向。例如，有人質疑宋代江南是地域形成先驅者的定說；亦有人提出反思，認為「地域」本身不一定非要以「中國」的框架來加以理解，等等。再者，本文也指出關於「地方統治」，儘管有從中央集權制度史和士人社會論兩方面出發的研究，但是，很少有研究採取將中央政府、地域士人兩者聯繫起來的視角。

考慮以上內容，從而去檢討構成宋代「近世」要素的「地域」成立時，有必要去追問人們地域意識的形成與記憶的過程。具體而論：有必要通過地方志所顯示的治績，去弄清楚地域意識和地方統治的時代變遷，這是本文得出對未來研究的展望。

* 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助手(亞洲史・東洋史學)。本論文是早稻田大學特定課題研究助成費(課題番號2013A-840)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本文由吳承翰、魏郁欣翻譯。

airiti

關鍵字：宋代、研究整理、地域、地方統治、「近世」論、時代性

airiti

一、前言

近年來在日本的東洋史學界，針對「近世」[1]究竟是哪個時期這個問題，展開了一場如火如荼的論爭。例如，朝鮮史研究者宮嶋博史認為：朱子學成立後，儒教的浸透在國家和社會意識層面獲得了確立，成為東亞全域共通的「近世化」的象徵現象，提出所謂「儒教的近代」的架構。相較於此，岸本美緒從中國史的立場提出反論，隨後在研討會、雜誌上展開了超越地域、國家的議論。[2]「近世」之所以成為問題，是因為建構傳統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多孕育於「近世」，這個傳統社會直接連結至近代，甚至到了現代，仍見其影響。為了追求這個價值觀的根源，有必要重新檢討「近世」的定義。目前，論爭的焦點已經從時代區分論轉移到下個階段。如同「各式各樣的近世」[3]一語所示，將社會區分為更細的要素，進而檢討各自「近世」的起源，這樣的方法已日益普遍。

---

[1] 有關「近世」一語之定義，將於文中逐次加以說明。預先說明的是，與內藤湖南基於歐洲史時代區分所提示的宋代位置，沒有直接的關連。又，和過去基於生產階段的時代區分論，也存在著若干距離。雖然從岸本美緒所指出的「(對中國史研究者而言)無法輕鬆地使用」這點來看，這顯得有些忸怩，但作為迫近「時代性」方法的「近世」框架來使用，這正是本論文的目的，懇請多加包涵。參照岸本美緒，《東アジアの「近世」（世界史リブレット13）》(東京：山川出版社，1998)，2。另外，有關「近世」的議論，永井和也做了整理，他將「近世」作為「世界構造的轉換」、「世界一體化」定型的時期，展開其議論。至於筆者的定義，與永井的整理相較之下顯得較為蕪雜，是從「世界史」的立場後退一步，嘗試在東亞地域「(內在的)近代化論」的框架中進行考察。參考永井和，〈東アジア史の「近世」問題〉，收入夫馬進 編，《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7)，512。

[2] 有關宮嶋博史的議論，參照〈日本史認識のパラダイム転換のために—「韓国併合」一〇〇年にあたって〉，《思想》2010年1月號(東京：岩波書店)，23。有關岸本美緒的批判，參照〈東アジア史の「パラダイム転換」をめぐって〉，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 編，《「韓国併合」100年を問う：2010年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東京：岩波書店，2011)，229-30。另外，2013年1月於東京大學駒場校區舉行了「『近世化』論と日本」研討會，圍繞東亞「近世化」的問題展開議論。又，與那霸潤的《中國化する日本》(東京：文藝春秋，2011)因題目刺激而在日本國內引起一陣熱潮，此書亦是基於該議論延長線上的「近世」論而發。

[3] 2012年明清史夏合宿(箱根高原旅館，2012年8月8日~10日)時的研討會之題名(報告者：伊藤正彥、上田信、濱島敦俊)。

airiti

其中，概觀中國史的「近世」論，可分為兩類研究趨勢。一是根據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識，主張宋代以降為「近世」的趨勢；一是根據社會經濟，主張明末清初時期以降為「近世」的趨勢。本來，「近世」的架構就是以追求「內發性近代化」的這個議論為基礎所設定的。[4]筆者認為：這種各持異見而互相展開議論、以深化理解的狀況，對於學界是有助益的。但是，應該注意的是：即使是明清史研究者們，也經常無意識地追溯「近世」的起源(而非「近世」本身)至宋代。[5]這是因為受到明清時期的史料性質、或是唐宋變革論的影響，許多研究者都表現出把宋代視為某種傳統之根源的傾向。

那麼，宋代到底具有何種與近代相互聯繫的要素呢？如前所述，作為宋代的根據，可以列舉政治制度、文化意識，其中最重要的是「科舉社會」，[6]即科舉制度的整備、浸透，以及隨之而來的士人階層的成立。藉由形式上平等的考試所構築的官僚制度，創造出均質、並且具有教養的知識人領導階層——「士」。雖然大多數的「庶」和他們依然有所區隔，[7]但以共同語言來表達意見的人群逐漸增加，這對社會帶來重大變化。而在此社會變化中特別應該注意的是作為「屬於士人們的空間」之「地域」概念的確立。[8]有別於王朝、國家的廣域性，從中分歧出來的「地域」擁有獨特的個性與歷史，士人們在其空間中努力活動著。必須注意的是：在中國，尤其是在以漢民族為主的地域，[9]這種獨特性完全在文化方面得到發揮，但與王朝、國家的一體性卻無衝突。毋寧說這種獨特性正是在中央派遣的地方官與士人階層

---

4 欲理解戰後日本追求「近代性」的議論，請參照如下著作等：マリウス B. ジャンセン 編，細谷千博 譯，《日本における近代化の問題》(東京：岩波書店，1968)。

5 例如，所謂「傳統社會」是宋代史或明清史都會使用的詞彙。基本上，固然形容各自時代時都會使用到此語，但一旦要追求此「傳統」的淵源時，則明清史追溯於宋代的情況仍是比較多的。

6 近藤一成，《宋代中国科挙社会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9)，3-15。

7 高橋芳郎，《宋—清身分法の研究》(札幌：北海道大學出版會，2001)，183-222。

8 在此對「地域」的定義是：共同享有日常空間，且持有一定歸屬意識的空間範圍。但關於其詳細內容，將另於文中提及。

9 在非漢民族地域裡，不一定必然會歡迎獨特性，而是與漢化的隙縫之間，以一種微妙的存在去對應著。參照上西泰之，〈北宋期荊湖路荊峒蠻地開拓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54-4(1996.03)：610-652。

airiti

共有的認識之下所產生的。因此，在考慮「地域」的時候，將王朝推行的「地方統治」[10]切割開來思考，這是不可能的。

考慮到「地域」及「地方統治」時，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研究潮流，那麼應該從何檢討而起呢？關於日本方面較新的研究整理，有遠藤隆俊等人所編的《日本宋史研究の現状と課題》，[11]其中提及：「地域社會史研究最大的特色，並非從國家與首都一側來觀察歷史，而是從基層社會的角度來觀察之」、「在所謂地域的場所中，釐清不僅是政治、還包括經濟、宗教、文化等各種要素，如何摻雜在一起而產生社會變動」、「所謂『地域』的發想與以下認識有關，即把經常視為理所當然的『中國』這個框架，放在一個更為廣闊、柔軟的位置」，如上所示，為了考慮與此次課題「近世」之間的關聯，有必要先理解此背景，即(日本的)宋代「地域」或「地方統治」研究的目的與價值。通過理解研究史，進而檢討其與「近世」論之間，具有何種接榫點。

筆者曾通過宋代地方官留下的治績變化、以及地方志的編纂過程，試著去釐清有關宋代「地域」時代相貌的變化。[12]在其過程中，宋代如何與其後的元、明、清王朝相接續，抱持著此一疑問，開始思考宋代如何延伸至後續朝代的問題。本文從宋代的研究整理出發，通過「近世」論，希望對理解宋代和後續朝代間的關係，提供些許線索。

---

10 此處對「地方統治」的定義是：從中央派遣作為其代表之地方官，統治某一領域。又，在本次討論的對象中，不包含統治的「制度」。

11 遠藤隆俊 等編，《日本宋史研究の現状と課題》(東京：汲古書院，2010)。又，這裡引用的內容，是依據岡元司，〈地域社会史研究〉的部分，83-104。

12 小二田章，〈「名臣」から「名地方官」へ —范仲淹の知杭州治績に見る「名地方官像」の形成〉，《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53-4(2008)：53-67；小二田章，〈北宋初期の地方統治と治績記述の形成—知杭州戚綸・胡則を例に〉，《史観》165(2011.09)：19-47；小二田章，〈方志と地域 —杭州地域の歴代地方志「官績」項目を例に〉，《史滴》33(2011.12)：45-71；小二田章，〈『咸淳臨安志』の位置—南宋末期杭州の地方志編纂〉，《中国—社会と文化》28(2013.07)：118-138。

airiti

二、日本、中國、台灣、歐美的研究過程與特徵：以2004年以前的研究動向為主

本節將整理有關宋代「地域」、「地方統治」的先行研究。首先概觀日本的研究史。關於此點，前述《日本宋史研究の現状と課題》，以及其主編之一、已故的岡元司的遺稿集《宋代沿海地域社会史研究》，[13]已經做出極富參考價值的整理概括。由於這些著作已進行過詳細檢討，因此此處主要概觀整體脈絡。

日本的「地域」、「地方統治」研究始於社會經濟史，這是為了因應詳細檢討地域層級的需要，至 1970 年代為止，已有一定的成果。其內容完全透過以下方式來進行檢討，例如，所謂「中國」的框架，或是以國家自身為前提的地域，或是作為國家的一端、經濟性分枝的「地域」，或是作為「統治」系統的一個範例等等。[14]其後，以生產關係為中心的社會經濟構造檢討開始顯得窒礙難行，從而生出檢討中國社會特有的構造和「人的關係」之必要性，從 1980 年代初期開始提倡的地域社會論經由明清史研究、進而對宋代史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其中，「地域社會」的形成乃主要的檢討對象，具體來說包含了地域內以士人階層為中心的「人的結合」以及具有慣習和「秩序」的社會等問題。[15]如此描繪出來的地域是一種具有經濟、文化獨特性的地域，往往也顯示出對中央的離心性(它被描繪成為一種從所謂「中央統治對象」的概念中分離出來的存在)。

從國家或中央集權的觀點所見的「地域」，以及從個別地域社會的觀點

---

[13] 岡元司，《宋代沿海地域社会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2)。另外請參照小島毅《史学雑誌》122-6(2013.06)：1124-1132，小林義廣《東洋史研究》72-2(2013.09)：335-343，兩人對該書之書評。

[14] 例如，周藤吉之，《唐宋社会経済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2)中所見的鄉村研究，佐竹靖彦，《唐宋変革の地域的研究》(京都：同朋舍，1990)裡收錄的四川地域研究等。

[15] 有關明清史提倡的「地域社會論」，參照森正夫，〈中国前近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会の視点〉，《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83(1982)：201-223。宋代史的地域社會論，有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経済史の研究》(改訂版，東京：汲古書院，2001)；渡辺紘良，〈宋代福建社会の一面—陸棠伝訳注補〉，《独協医科大学教養医学科紀要》5(1982)：5-21，等等。

airiti

來看的「地域」，其後構成了日本「地域(地方統治)」研究的兩條主軸，各自發揮作用。有關前者，包含鄉村社會研究、或胥吏研究等在內的地域支配構造研究，描繪出一幅亟欲將支配力擴至末端的國家姿態。[16]另一方面，後者則從地域社會有力者的婚姻、交友關係等所浮現出來的網絡，進而通過「地域社會」的構築，描繪出地域如何得到其歷史性特質的過程。[17]兩者分別從「國家—地域」、「地域—士人」這兩種不同的觀點出發，描繪出不同的「地域」像。

再者，自 1990 年代以降，作為前述地域社會論的延伸，開始探討士人社會當中的共通認識，也就是對於“Intellectual History”的檢討，從思想史、文學研究出發的「地域」研究遂大量問世。[18]這些研究深入挖掘了已檢討過的「人的結合」和通過學問、教育而來的規範形成等問題，對解明宋代社會的本質帶來極大貢獻。另一方面，這些「地域」研究大多基於中國文化史的觀點，以「宋明連續」作為展開議論的前提，至於，基於中央集權觀點的「地域」研究，則重視「唐宋變革」，[19]這兩條主軸相互對立的狀況日益鮮明。

以上是日本「地域」、「地方統治」研究的概觀。換言之，以所謂「國家—地域、社會經濟・制度、唐宋變革」的軸線，和所謂「地域—士人、地域社會、宋明連續」的軸線為中心進行推移，這兩條主軸時而發生衝突，時而相互並存著。

接著概觀中國的研究。有關中國和後述台灣方面的研究，因為已有吳

---

16 代表的例子可以舉出：伊藤正彦，《宋元鄉村社会史論》(東京：汲古書院，2010)，今泉牧子，〈宋代の県令の一側面—南宋の判語を手がかりに〉，《東洋學報》87-1(2005.06)：69-100，等等。

17 代表的有：宋代史研究会 編，《宋代社会のネットワーク》(東京：汲古書院，1998)，與前揭岡元司之書；此外，還有山根直生，〈唐宋間の徽州における同族結合の諸形態〉，《歷史学研究》804(2005.08)：37-56；山口智哉，〈宋代「同年小録」考—「書かれたもの」による共同意識の形成〉，《中国—社会と文化》17(2002.06)：100-124，等等。

18 代表的有：小島毅，《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礼の言説》(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6)；市來津由彦，《朱熹門人集団形成の研究》(東京：創文社，2002)；中砂明德，〈士大夫のノルムの形成—南宋時代〉，《東洋史研究》54-3(1995.12)：472-503，等等。

19 例如，大澤正昭，《唐宋変革期農業社会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6)。

airiti

雅婷的詳細整理，[20]此處僅止於概略敘述，並追加若干內容。中國研究動向的前提是「本國史」的觀點。也就是說，將中國宋代史作為本國史來考慮，很容易流於國家史，有礙於「地域」研究的發展。而在「本國史」的前提下，中國的歷史學研究又因文化大革命有所中斷。不過即便如此，從重視中央集權的觀點出發、以「統治」系統為主的研究特別在財政、經濟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成果。[21]1990 年代後半情勢一變，冠上「地域」、「地方」之名的研究著作大量出版，產生了一股地域史的熱潮。[22]只是，這種流行是伴隨該地經濟勃興而來的產物，如所謂「地域〇〇文化」的題目所示，多數著作僅止於稱頌地方的特徵，使得良莠不齊的狀態繼續持續著。同時，「地域資料叢書」等著作陸續出版，「地域」研究的環境自 2000 年開始逐漸完備，其後，地域研究的學術水平也相對提高了。[23]

接著概觀台灣的狀況。除了一部份特定地域(南宋臨安等)的研究外，大部分多從「統治」系統與士人婚姻關係展開研究。[24]再者，因受到後述歐美、日本研究的影響，從較早的時期開始，即陸續出現具有地域性的研究。其特徵如下：一，對象地域以沿海地域(特別是浙東、福建)為主，二，對文化及教育賦予高度關心。[25]家族研究、宗教研究自 1990 年代以降，包括文化

---

20 吳雅婷，〈回顧一九八〇年代以来宋代的基層社会研究—中文論著討論〉，《中国史学》12(2002)：65-93。

21 包偉民，《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龍登高，《宋代東南市場研究》(昆明：雲南大学出版社，1994)。

22 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又，單一地域的事例，可參看包偉民、傅俊 等編，《浙江歷史文化研究論著目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其中提及的地域數量十分龐大。

23 例如王善軍，《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邢鐵，《宋代家庭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中所見的宗族、家族研究；顧宏義，《教育政策与宋代両浙教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中所見的教育研究；高柯立《官民之間：南宋地方官府與民衆的溝通》(北京：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中所見的地域士人研究；陳國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陸敏珍，《唐宋時期明州区域社会経済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中所見的地域經濟研究，等等。

24 例如梁庚堯，《南宋的農村經濟》(台北：聯經出版，1984)；陶晉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北：樂學書局，2001)，等等。

25 韓桂華、王明蓀 編著，《戰後台灣的歷史學研究》，第四冊〈宋遼金元史〉(台北：國家科學委員會，2004)。其他如：黃寬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

airiti

人類學的成果在內，得到極大成果。[26]

以上是中國和台灣大致上的狀況。中國受到自國史及其價值觀的限制，主要的研究多將中國視為一個整體。當中雖然存在著僅是單純地製作(自傲的)鄉土史的問題，但也可說替各式各樣的「地域」研究打下了基礎。再者，有關台灣方面，亦有對於現代的關懷，因此獲得了不少有關沿海地域的優秀研究成果。

接著概觀以美國為中心的歐美地域的研究史。有關這方面，H. Zurndorfer(宋漢理)已做了極具參考性的概括，[27]因此此處僅敘述大略的趨勢。

在被政治、社會寄予重責大任的情況下，歐美的中國史研究從最初就具有很強的地域研究方向性。[28]他們(通過對自國的移民與經濟活動)追求的多是與他們直接交涉的地域。以宋代地域研究為發端的 Skinner(施堅雅)、Hartwell(郝若貝)等的研究中，[29]他們以自己所接觸的地域及從中得出的地域理解為藍本，描繪出社會經濟的、或者社會結合的地域像。

歐美中國史研究的另一個特徵就是相較於亞洲的地域研究，具有將國家視為是分權的，並重視個人的傾向。這在繼承前述二者研究的 Hymes(韓明士)的研究中，有更鮮明的表現。[30]他所描繪出的地域士人們，是內發性地形成地域的人群，他將宋代形容為士人們的關心由中央轉向地域的時期。這種傾向本身與 Bol(包弼德)的研究是共通的，他從思想史觀點出發，

力的探討》(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2)；劉馨珺，《明鏡高懸：南宋縣衙的獄訟》(台北：五南圖書出版，2005)，等等。

26 例如：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柳立言，《宋代的家庭與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沈宗憲，《宋代民間的幽冥世界觀》(台北：商鼎出版社、1993)，等等。

27 ハリエット・ズンドファー 著，吉田真弓 譯，〈宋代地域社会の概観〉，收入伊原弘 等編，《中国宋代の地域像》(東京：岩田書院，2013)，55-86。

28 參照：ポール A.コーエン 著，佐藤慎一 譯，《知の帝国主義》(東京：平凡社，1988)。

29 參照：G.W.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並參考 Robert M. Hartwell, *A Guide to Sources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A.D 618-126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30 參照：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airiti

描繪了生存於地域的士人。[31]但是，對於描繪了北宋和南宋士人的性質差異、並且以婺州金華為主敘述了至明清為止的思想系譜的 Bol 來說，這到底是否是「分權性」的問題，得到了更加慎重的處理。

據以上整理，歐美的情況與中國、台灣不太相似，其研究並非以國家的架構為前提，而是直接以地域為對象來進行的。其結果，可說產生了有關士人本質的特徵性視點與研究。所謂「宋元明移行」的時代區分，也是其副產品。[32]

至此，敘述了各地域的研究狀況。目前為止為了敘述的方便，獨立進行了敘述，當然它們之間也存在著相互的影響(例如，日本的「唐宋變革論」、台灣的家族研究等)。其影響開始變得更加緊密，可說是在 1990 年代的後半。那麼，以這些影響為基礎，到底哪些宋代「地域」、「地方統治」研究是必要的呢？如前所見，各自追求的宋代「地域」研究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在概括這些研究之後，到底該如何定義所謂必要的「地域」呢？進一步說，應該如何設定他們所共有的「近世」呢？

儘管尚不完全，此處仍努力嘗試提供一種可能的切入點。從目前為止的狀況來看，有關「地域」的成立，是以對「地域」士人階層的研究為優先，至於結合「地方統治」的要素則相對地欠缺。再者，有關地域形成的研究是否得出充分成果了？仍是疑問。解決這些問題的話，理應可以對前述問題提出一個回答。在次節中，希望檢討近年的研究及其問題意識，包含假說的對錯，以展開問題。

---

31 參照：Peter K.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以及ピーター・ボル 著，鈴木弘一郎 譯，〈地域史と後期帝政国家について—金華の場合〉，《中国—社会と文化》20(2005.06)：364-389。又，延續Hymes對此時期的「地域」研究，尚可舉出：Hugh R. Clark(柯胡), *Community, trade, and networks: Southern Fujian Province from the third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Beverly J. Bossler(柏文莉), *Powerful relation: kinship, status, & the state in Sung China (960-127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2 Paul J. Smith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airiti

三、2008年前後的展開：現狀及其課題

在本節中，將對最近的研究動向進行更詳細的介紹，以釐清問題意識。同時也試圖釐清其希冀的是何種「地域」、「地方統治」研究。

首先舉出的是，以前述的故岡元司等日本的地域史研究者們為核心，所推動的大規模科研，即通稱的「寧波計畫」，[33]該計畫已經成功地結束了。以寧波(明州)的各種交流和文化作為對象的這項研究，使寧波等沿海地域的地域史和透過東中國海全域的交流所浮現的地域像等，作為「海域」研究有了飛躍性的進步。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環境以及交流等各種切入點，對沿海地域的「地域史」有了進一步的了解。[34]如同上田信的「蜃気楼王国」所示，[35]提示了一種將「海域」納入視點，從而描繪出新的歷史觀的手法。這些重大成果，一方面來說顯示了以下課題：即這些沿海地域的事象究竟如何與非沿海地域產生聯繫，並賦予其影響。其後，以計畫的成果為基礎，出版了許多關於「海域」的研究書，使這個課題開始進入了更深層次的檢討。[36]

其次是華北地域研究的進展，以及伴隨而來對宋代「地域」研究的再檢討。至此所論及的宋代「地域」研究，因史料殘存的狀況，主要是以南宋、且偏重江南地域的狀態而展開的。這也不僅是宋代，不妨說是因為受到明清時期醞釀出一種「江南地域乃漢民族文化先進地域」之意識的影響。[37]對於這種狀況，由金、元史研究者對當時的華北，特別是以山西地域為中

---

[33] 文部科学省特定領域研究「東アジアの海域交流と日本伝統文化の形成－寧波を焦点とする学際的創生」(代表者：小島毅，2005~2009)。請參照該計畫的網址：http://www.l.u-tokyo.ac.jp/maritime/index.html。

[34] 請參照吉尾寛 編，《海域世界の環境と文化》(東京：汲古書院，2011)等「東アジア海域叢書」的成果。

[35] 參考：上田信，《シナ海域蜃気楼王国の興亡》(東京：講談社，2013)。

[36] 例如，小島毅 監修的《東アジア海域に漕ぎ出す》系列(現在刊行至第3集。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係以海域和各地文化為中心，重新展開檢討。

[37] 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会，2006)一書，從蒙古、元朝的視角出發，再次檢討作為江南文化產品的出版物，企圖重新詮釋其歷史地位。

airiti

心所描繪出的地域像，與迄今為止的「地域」研究所得出的印象完全不同，[38]遂造成了很大的衝擊。

這種衝擊主要表現為如下兩點。首先，本來於 1980 年代提出地域社會論之際，作為對當時社會經濟史議論的建議，提出了「對社會內在發展要素的追求」，一方面雖推進了宗族和地域信仰的研究並賦予其影響，但另一方面也產生了把漢民族地域所構築起來的慣習視作是中國慣習的傾向。對此，金、元史研究者們將華北社會視為晚唐以降從漢民族與游牧民族混居的地域中所孕育出的產物，且再次提示了其中的社會與慣習。過去向來將「地域」研究的最終目的視為是對中國的解明，而上述檢討遂對此種意識提出了痛切的、強烈的異議。另外一點則是史料面的差異。本來，造成對華北社會的檢討緩慢不前的理由，即因缺乏文獻史料的記載之故，但隨著森田憲司等人先驅性地促使碑文、石刻等研究日益成熟，[39]獲得大量新史料的結果，乃得以描繪出新的社會像。這點不僅對華北地域社會的研究，同樣也對江南地域研究帶來很大影響，從而引發再次檢討宋代地域史料學方面的另一潮流。[40]造成以上衝擊之際，隨著華北地域社會史研究的進展，也引發了對於「中國」領域境界的再檢討，[41]以及所謂宋代的時代究竟連結到何種社會，最終形成何種傳統等問題，於是，在宋代「地域」研究當中展開了對於時代定義的再檢討。[42]

第三，可舉出台灣黃寬重的「嘉定現象」論。在台灣，以明州為中心的家族研究等[43]主要領導了南宋時期「地域」研究的黃寬重，於近年提出的

---

38 參考：井黒忍，《分水と支配:金・モンゴル時代華北の水利と農業》(東京：早稲田大學出版部，2013)；飯山知保，《金元時代の華北社会と科挙制度:もう一つの「士人層」》(東京：早稲田大學出版部，2011)。

39 參考：森田憲司，《元代知識人と地域社会》(東京：汲古書院，2004)。

40 例如，須江隆 編的《碑と地方志のアーカイブズを探る》(東京：汲古書院，2012)中所能見到的那樣，即對於石刻研究或地方志等史料所作的重新檢討。

41 吉野正史，〈今昔の衢にある歴史学〉，《史滴》33(2011.12)：2-24，該文將有關前近代境界的研究、理論，作了很好的整理總括。

42 例如，飯山知保，〈稷山段氏の金元時代〉，收入飯山知保，《金元時代の華北社会と科挙制度》，345-369。此文將稷山段氏一族自宋代開始如何存續下去的課題，以個案研究方式描繪出來。

43 請參照註25之內容。

airiti

假說中，認為在南宋後期的嘉定年間(1208-1224)形成了士人社會的萌芽，這與後來明清時期的傳統形成密切關聯。[44]這個假說與前述「宋元明移行論」等，皆受各種時代區分論的影響，唯其特徵在於將士人社會的傳統文化形成置於分析的中心，將中央政府的「地方統治」和士人社會共同構築地域的狀態，視為是傳統社會形成的表現。這個見解對於深受傳統價值觀的影響、漠然地將文化淵源與宋代連結起來的思考方法，進行了檢討，這與道學的接受究竟發生於哪個時點的問題意識，是表裡一體的。現在，黃寬重進行著通稱「游與藝」的大規模科研，[45]從學問、詩文、玩物、繪畫等各種角度，來檢討傳統文化的形成，且試圖釐清南宋後期士人社會的形成過程，及其成為明清社會的發展歷程。

第四，可舉出歐美學界動向的變化。如前所述，從地域研究轉向對該地域的認識，歐美學界亦深化了相關研究。根據其論述研究之成果，涉及制度史或社會經濟史等具體內容的研究，近年也在增加當中。[46]這和前述台灣的動向，即檢討士人社會中所形成的思想動向如何與現實社會產生聯結，兩者恰好形成對照。又，對地方志等地域文獻史料的關心提高，欲賦予其歷史意義的研究也大幅增加了。[47]

---

[44] 這個議論的要素，已可見於黃寬重，〈宋代基層社會的權力結構與運作—以縣為主的考察〉一文，收入黃寬重 編，《中國史新論》，基層社會分冊(台北：中央研究院，2009)，273-325。目前更為詳細的討論，則可於第十五屆中國宋史年會(開封：河南大學，2012年8月17~19日)，於黃寬重所主持的「嘉定現象—南宋嘉定時期的政治社会與文化」論壇中，看到相關的議論。

[45] 國科會計劃：培育年輕學者卓越研究能力計劃「游與藝—十三至十四世紀士人的文化活動與人際網絡」。

[46] 請參照：Hilde de Weerdt,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1127-1276)*"(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Anne Geritsen, "*Ji'an Literati and the Local in Song-Yuan-Ming China*"(Leiden: Brill, 2007)，以及小林義廣的書評，《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35(2011)：115-128。

[47] 請參照：James M.Hargett , "Song Dynasty Local Gazetteers and Their Place in History of Difangzhi Writ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6.2(December1996)；ピータ・ボル 著，高津孝 譯，〈地域史の勃興—南宋・元代の婺州における歴史・地理学と文化〉，收入高津孝 編，《中国学のパースペクティヴ》(東京：勉誠出版，2010)，237-286；Ruth Mostern, *Dividing the Realm in Order to Govern: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ong Sta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airiti

以上是關於近年主要研究的問題意識，根據這些內容，筆者試著思考宋代的「地域」、「地方統治」研究具有何種價值。首先，設定和既有的「地域」觀不同的地域、從而獲得新視角的意識乃是上述研究的共通特色。這個意識使既存的江南地域研究相對化，再次去追問理解江南地域形成究竟具有何種意義。從而，對於宋代的「江南地域」或關於「南宋時期」先驅性「地域」形成的定說，也提出了質疑。又，儘可能不受限於「中國」這個框架的意識也產生了一些問題。例如，「地域」自身究竟應放在東亞社會中的哪個位置進行檢討？這個「地域」給予哪裡影響、如何發生關聯呢？其次有關「地方統治」，即使這涉及了中央集權制度史與士人社會論兩者的問題，但是鮮少有研究關注處於兩者中間的「媒介者」。黃寬重已經提出了與士人社會共同合作的縣(地方統治者)的形象正是關鍵，其「媒介者」也是出身於士人階層，如地方志的製作，兩者相互影響，形成了所謂「地域」。那麼，這個「媒介者」在傳統社會的形成中，占有何種位置呢？為了嘗試回答這些問題，筆者認為立足於現在所進行的「地域」、「地方統治」研究之上是有其必要的。

那麼，這些研究成果如何與「近世」相結合呢？在次節中，將根據至此考察的結果，來探討「近世」論與宋代的位置。

四、再思考「近世」論：如何定義近世？

本節主要檢討以下問題：宋代的「地域」、「地方統治」研究可以描繪出何種「近世」架構？對於目前的「近世」論還能補充哪些部分？或者提示出哪些新的可能性？

所謂「近世」論的基礎，著重在透過某種形式去獲得「近代」社會的條件，即生產手段、社會權利、思想信條等方面的萌芽。相對於本來「基於生產階段論的資本主義生產階段、社會統合的萌芽＝近世」的圖式，近世論的視點可說是細分化了原來的架構，並且將關心擴至近代。又，為了對抗所謂歐美霸權統合的見解，更加重視社會的內發性產物。例如，前述的宮嶋的「儒教的近代」，即通過儒教(朱子學)這個要素，針對國家制度、

airiti

外交體制、統治系統與人們的道德規範等，具共通性、又各自獨立的認識和社會架構陸續出現於東亞地域全域中的這個現象，去讀取其近代性。[48]對此提出批判的岸本的議論也是以社會經濟史方面生產手段的獨立為前提，去敘述各地域社會獨特秩序的形成。兩者可說是基於同樣的問題意識。

那麼，通過「地域」、「地方統治」研究，可以如何解讀「近世」呢？如前節所述，問題在於人們意識上的邊界，和在那之中人們所創造出來的規範意識與秩序。筆者所理解的「地域」，其實是人們具有歸屬感的空間。因此，地域的廣度與大小，並非實際的地理邊界或行政空間，而是取決於人們的歸屬感範圍、是在人們的意識之中決定的。思考此點的關鍵在於，宋代以降的中國社會，由人們歸屬感所決定的「地域」範圍，與「地方統治」的行政單位，大致是重疊的。[49]所以，思考人們歸屬感的範圍時，也必須去檢討「地方統治」給予人們的影響。基本上，「地方統治」正是中央政府對地方的「統治」，是把來自中央所提出的規範加諸於「地方」，從而與在「地域」之中孕育而出的秩序相互接觸。檢討上述兩者千絲萬縷的關係，是為了理解「地方統治」和「地域」的互動時必要的程序。通過以上的研究回顧可知，所謂「近世」的圖像分為兩個過程，一個是在「地域」與「地方統治」的相互作用下，按自身的地理環境與歷史傳統，逐漸形成地域社會的外在、客觀性過程，另一個則是在「地域」和「地方統治」這兩個要素的互動中，人們形成其歸屬感的內在、主觀性過程。儘管 Bol 等人也已經嘗試如此檢討地域像了，[50]然而若以「近世」作為問題意識的話，應該重新「沿著史料」去評估傳統社會的重要性。如前所述，「近世」框架的意義在於，透過自身的歷史變遷去考慮傳統社會中的近代性。如果重視內在要素的話，那麼我們必須弄清楚史料中出現的闡述，是在何種歷史脈絡中形成的。因此，讀取瞬息萬變的「時代性」的有效方法，就是不斷地概觀各個地域及各個歷史現象。

---

48 但是，此一議論可以窺見丸山真男的影響，丸山將日本近代化的前提設定於江戶時期的儒學。請參考註4所提到的マリウス B.ジャンセン一書。

49 小二田章，〈方志と地域 —杭州地域の歷代地方志「官績」項目を例に〉：45-71

50 ピータ・ボル 著，高津孝 譯，〈地域史の勃興—南宋・元代の婺州における歷史・地理学と文化〉，237-286

airiti

另外不得不提及的是：前節所述的「地域」、「地方統治」研究，最終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如前所述，即使以南宋江南的某個「地域」作為對象，它也未必能夠代表全中國的情況。又，如同「海域」研究可知：設定一個超越既存民族、國家等的「地域」，也是有可能的。以「地方統治」為要素時，因受到當時王朝政府的影響，也能以王朝的時間斷限作為暫定的架構，但那完全是為了要分析一個事件、一個歷史現象所採用的手段；當「近世」的時代區分成為問題意識時，以王朝來劃分時代的手法已經不具意義了。又，這個「近世」在空間上的範圍和廣度又是如何呢？我們應該留意的是，從中國的某個地域到中國的南北，再到中國全體或東亞，甚至到歐亞規模者，都具有檢討的可能性，。有關這點，將另以世界史的「近世」和「地方統治」為中心，重新加以整理。[51]

接著，宋代研究稱得上是「近世」研究嗎？再次回到這個問題。如本文開頭所述，明清史研究者多半具有將宋代作為「近世」淵源的傾向，其中一個原因來自內藤湖南提倡的「唐宋變革論」，[52]其中把社會階層的成立和文化的變化，解釋為「近世」性的變化。但是，如同「明代人對於宋代的認識」所示，通過史料，追求傳統價值觀根源的感覺不斷地摻雜在研究之中。

宋代在何種意義上可以稱作「近世」呢？有關這次的「地域」、「地方統治」研究，也有必要從「時代性」的要素來進行檢證。檢討該「時代性」時，宋代的要素於其他時代中應如何解釋、賦予何種意義？考慮這點也很重要。從宋代往下溯的時候，可以看到何種變化呢？前述從明清上溯的意識，與來自宋代的要素在哪裡擦出火花呢？是否產生了新的價值判斷？釐清以上諸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管見以為，有兩個時期是關鍵所在。一是元末到明初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元代沉潛於民間的朱子學首次作為漢民族江南文化，得到明王朝

[51] 例如，日本近世史研究者深谷克己提示的「明君論」，或者「關於政書在江戶的流行」，在思考有關「近世」的「地方統治」之比較時，非常有意思。參考深谷克己，《深谷克己近世論集》，第二卷〈偃武の政治文化〉(東京：校倉書房，2009)。

[52] 有關內藤湖南以及宮崎市定相關的「唐宋變革論」和「東洋的近世」，請參照永井和，〈東アジア史の「近世」問題〉一文。

airiti

的公認，[53]但顯示此點的史料極少，筆者認為了解該時期人們的意識與價值判斷，和這次的問題同等重要。此外還有一個是構成前述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論」關鍵的五代十國時期。重要的是，檢討宋代的近世特徵是否已經出現在前代。[54]通過對這些時期的檢討，也就不得不重新檢驗宋代是否為「近世」了。

五、結論

至此，整理了宋代「地域」、「地方統治」的相關研究，並且檢討了其與「近世」的的關係。筆者到目前為止，以杭州作為對象地域，針對北宋時期地方官治績的形成和後世解讀的方式，以及製作於南宋時期的地方志的編纂背景和對於記載內容發揮影響力的社會性要素，進行了檢討。[55]在博士學位論文裡，整理了有關宋代的研究。根據其內容可知：通過地方志或地域所確立的治績，對於地域和地方統治的時代性研究，是有其必要的。宋代和後續朝代，在治績的變化過程當中，產生了何種差異？又，從宋經元以至明清，地方志的編纂產生了何種變化？目前筆者已嘗試進行檢討，[56]並且將其與何謂「近世」的問題意識加以對照，希望重新釐清其歷史性位置。例如，有關元末明初時期，通過檢討地方志等史料編纂的變化，希望去考察該時期人們的思考與「地域」觀。由於進行的研究是以一個一個的事件或史料為對象，個別的成果遂成為一種範本，而釐清這些各自構成「近

---

53 Peter K. Bol, “Neo-Confucianism and Local Society, Twelfth to Sixteenth Century: A Case Study”, Paul J. Smith ed.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54 有關這點，山崎覺士，《中国五代国家論》(京都：思文閣，2011)是先驅性的研究。但是，該書前半描繪十國吳越所具有的特異的王權論，在被宋朝所吸收後的杭州，究竟是以什麼樣的地域性去發揮作用的？筆者不太能理解，今後的課題仍然很多。

55 小二田章，〈「名臣」から「名地方官」へ —范仲淹の知杭州治績に見る「名地方官像」の形成〉：53-67；小二田章，〈北宋初期の地方統治と治績記述の形成—知杭州戚綸・胡則を例に〉：19-47；小二田章，〈方志と地域 —杭州地域の歷代地方志「官績」項目を例に〉：45-71；小二田章，〈『咸淳臨安志』の位置—南宋末期杭州の地方志編纂〉：118-138。

56 在小二田章〈方志と地域〉一文中，對明清時期製作的地方志之記載，進行了初步的分析。又，現在正在投稿中的〈治績の記載と地方統治—張詠「拔茶」事例をめぐって〉，以一個宋代治績的事例，嘗試通觀整個王朝時期的變化。

airiti

世」的要素，才能產生具有說服力的效果。(進言之，藉著反思從「時代性」的要素到「地域」的空間形成過程，則「地域」對現實社會帶來的影響可說是更為迫切吧。)

最後，再次思考追問「近世」的意義。所謂「近世」，就其意義而言，可說是與現代相結合的社會(即近代、近世)之中，最為古老的部分。稍微跳躍性思考的話，筆者認為追問「近世」的意義在於檢討近世社會有多少程度與現代社會互相連結。是故，在考慮到近世與現代同具連續性的架構之上，追問人們對於「近世」的認識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57]構成其關鍵的正是人們的「歷史認識之歷史」，從中追問當時人們日常所保存的記憶以及共通認識，[58]是今後欲展開的工作。

[57] 在イアン・ハッキング 著，出口康弘 等譯，《知の歷史学》(東京：岩波書店，2012)一書所述「歷史的唯名論」中指出：人類唯有獲得語彙，才能構成人類。納入此一觀點，並追問此一認識本身，可以推測在實際上是十分重要的。

[58] 長谷川大和，〈魏晋南北朝における歷史の視座〉(東京：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修士学位論文，2012)一文，將關於記憶的研究簡明扼要地進行了整理。如此篇碩士論文所提到的，除了民族的記憶、創傷(trauma)所印刻的記憶力量之外，以緩慢的時間所製作出來的「馴化的記憶」，在宋代以後中國史的「地方統治」一端，不是也發揮了作用嗎？這和渡邊浩所指出的，於「近世」日本發揮作用的「御威光」也具有相似的效果吧。參照：渡邊浩，《東アジアの王権と思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7)。

airiti

徵引書目

(一)中日文專書、論文

1. イアン・ハッキング 著，出口康弘 等譯，《知の歴史学》，東京：岩波書店，2012。
2. ハリエット・ズンドファー 著，吉田真弓 譯，〈宋代地域社会の概観〉，收入伊原弘 等編，《中国宋代の地域像》，東京：岩田書院，2013。
3. ピーター・ボル 著，高津孝 譯，〈地域史の勃興—南宋・元代の婺州における歴史・地理学と文化〉，收入高津孝 編，《中国学のパースペクティヴ》，東京：勉誠出版，2010。
4. ピーター・ボル 著，鈴木弘一郎 譯，〈地域史と後期帝政国家について—金華の場合〉，《中国—社会と文化》20(2005.06)：364-389。
5. ポール A.コーエン 著，佐藤慎一 譯，《知の帝国主義》，東京：平凡社，1988。
6. マリウス B.ジャンセン 編，細谷千博 譯，《日本における近代化の問題》，東京：岩波書店，1968。
7. 伊藤正彦，《宋元郷村社会史論》，東京：汲古書院，2010。
8. 井黒忍，《分水と支配：金・モンゴル時代華北の水利と農業》，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13。
9. 永井和，〈東アジア史の「近世」問題〉，收入夫馬進 編，《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
10. 遠藤隆俊 等編，《日本宋史研究の現状と課題》，東京：汲古書院，2010。
11. 岡元司，《宋代沿海地域社会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2。書評：小島毅，《史学雑誌》122-6(2013.06)：1124-1132；小林義廣，《東洋史研究》72-2(2013.09)：335-343。
12. 岸本美緒，〈東アジア史の「パラダイム転換」をめぐって〉，收入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 編，《「韓国併合」100年を問う：2010年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東京：岩波書店，2011。
13. 岸本美緒，《東アジアの「近世」（世界史リブレット13）》，東京：山川出版社，1998。
14. 吉尾寛 編，《海域世界の環境と文化》，東京：汲古書院，2011。

airiti

15. 吉野正史，〈今昔の衢にある歴史学〉，《史滴》33(2011.12)：2-24。
16. 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
17. 宮嶋博史，〈日本史認識のパラダイム転換のために―「韓国併合」一〇〇年にあたって〉，《思想》，2010年1月号，東京：岩波書店。
18. 近藤一成，《宋代中国科挙社会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9。
19. 高橋芳郎，《宋―清身分法の研究》，札幌：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01。
20. 今泉牧子，〈宋代の県令の一側面―南宋の判語を手がかりに〉，《東洋学報》87-1(2005.06)：69-100。
21. 佐竹靖彦，《唐宋変革の地域的研究》，京都：同朋舎，1990。
22. 山口智哉，〈宋代「同年小録」考―「書かれたもの」による共同意識の形成〉，《中国―社会と文化》17(2002.06)：100-124。
23. 山根直生，〈唐宋間の徽州における同族結合の諸形態〉，《歴史学研究》804(2005.08)：37-56。
24. 山崎覚士，《中国五代国家論》，京都：思文閣，2010。
25. 市来津由彦，《朱熹門人集団形成の研究》，東京：創文社，2002。
26. 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経済史の研究》，改訂版，東京：汲古書院，2001。
27. 周藤吉之，《唐宋社会経済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2。
28. 小島毅 監修，《東アジア海域に漕ぎ出す》，目前刊行至第三集，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 。
29. 小島毅，《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礼の言説》，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
30. 小二田章，〈「名臣」から「名地方官」へ―范仲淹の知杭州治績に見る「名地方官像」の形成〉，《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53-4(2008)：53-67。
31. 小二田章，〈『咸淳臨安志』の位置―南宋末期杭州の地方志編纂〉，《中国―社会と文化》28(2013.07)：118-138。
32. 小二田章，〈方志と地域―杭州地域の歴代地方志「官績」項目を例に〉，《史滴》33(2011.12)：45-71。
33. 小二田章，〈北宋初期の地方統治と治績記述の形成―知杭州戚綸・胡則を例に〉，《史観》165(2011.09)：19-47。
34. 上西泰之，〈北宋期荊湖路荊峒蛮地開拓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54-4(1996)：610-652。
35. 上田信，《シナ海域蜃気楼王国の興亡》，東京：講談社，2013。
36. 森正夫，〈中国前近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会の視点〉，《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83(1982)：201-223。
37. 森田憲司，《元代知識人と地域社会》，東京：汲古書院，2004。

airiti

38. 深谷克己，《深谷克己近世論集》，第二巻，「偃武の政治文化」，東京：校倉書房，2009。
39. 須江隆 編，《碑と地方志のアーカイブズを探る》，東京：汲古書院，2012。
40. 宋代史研究会 編，《宋代社会のネットワーク》，東京：汲古書院，1998。
41. 宋代史研究会 編，《宋代人の認識：相互性と日常空間》，東京：汲古書院，2001。
42. 大澤正昭，《唐宋変革期農業社会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6。
43. 中砂明德，〈士大夫のノルムの形成—南宋時代〉，《東洋史研究》54-3(1995.12)：472-503。
44. 長谷川大和，〈魏晋南北朝における歴史の視座〉，東京：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修士学位論文，2012。
45. 渡辺浩，《東アジアの王権と思想》，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7。
46. 渡辺紘良，〈宋代福建社会の一面—陸棠伝訳注補〉，《独協医科大学教養医学科紀要》5(1982)：5-21。
47. 飯山知保，《金元時代の華北社会と科挙制度:もう一つの『士人層』》，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11。
48. 與那覇潤，《中国化する日本》，東京：文芸春秋，2011。
49. 王善軍，《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0. 包偉民，《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1. 包偉民、傅俊 等編，《浙江歷史文化研究論著目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
52. 吳雅婷，〈回顧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宋代的基層社會研究—中文論著討論〉，《中国史学》12(2002)：65-93。
53. 沈宗憲，《宋代民間的幽冥世界觀》，台北：商鼎出版社，1993。
54. 邢鉄，《宋代家庭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5. 柳立言，《宋代的家庭與法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6. 高柯立，《官民之間：南宋地方官府与民衆的溝通》，北京：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論文，2006。
57. 梁庚堯，《南宋的農村經濟》，台北：聯經書局，1984。
58. 陳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
59. 陶晉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北：樂學書局，2001。
60. 陸敏珍，《唐宋時期明州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1. 黃寬重，〈宋代基層社會的權力結構與運作—以縣為主的考察〉，收入黃寬重編，《中國史新論》，基層社会分冊，台北：中央研究院，2009。
62. 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

airiti

63. 黃寬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2。
64. 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鄭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65. 劉馨珺，《明鏡高懸－南宋縣衙的獄訟》，台北：五南圖書出版，2005。
66. 龍登高，《宋代東南市場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4。
67. 韓桂華、王明蓀 編，《戰後台灣的歷史學研究》，第四冊「宋遼金元史」，台北：國家科學委員會，2004。
68. 顧宏義，《教育政策與宋代兩浙教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二)英文專書、論文

1. Anne Geritsen, *Ji'an Literati and the Local in Song-Yuan-Ming China*, Leiden: Brill, 2007. 書評：小林義廣，《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35(2011)：115-128。
2. Beverly J.Bossler, *Powerful relations: kinship, status, & the state in Sung China (960-1279)*,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 G.W.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4. Hilde de Weerdt,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 (1127-127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5. Hugh R. Clark, *Community, trade, and networks: Southern Fujian Province from the third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6. James M.Hargett, "Song Dynasty Local Gazetteers and Their Place in History of Difangzhi Writ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6.2, 1996.
7. Paul J. Smith ed.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8. Peter K.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9. Robert M. Hartwell, *A Guide to Sources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A.D. 618-126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10. 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1. Ruth Mostern, *Dividing the Realm in Order to Govern: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he Song Sta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airiti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ity: Taking Song Dynasty Regional Identity and Local Governan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Konita Akira

Research Associate (Asian History), Faculty of Letters, Arts and Sciences, Waseda University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modernity" i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a reexamination of local governance and regional consciousness in Song Dynasty China. Broadly speaki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as belonging to China's "modern" era, or at least the beginnings of that era, is justified on the grounds that it was during this era that the *keju*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took firm root in China, leading to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cholar-gentry class.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onsciousness among the scholar-gentry, and on the question of local governance, which was closely linked to this sense of regional identity.

Firstly, regarding the question of regional ident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ain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displayed by the research on this topic that has been undertaken in Japan, China, Taiwa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he study then proceeds to identify some of the common trends in this research that have emerged since 2008. For example, some scholars have begun to question the established theory that it was the Jiangnan region that led the way in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identity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other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very concept of "region" itself does not necessarily have to be interpreted within the wider framework of a concept of "China." The present study also notes that, while the issue of local governance has been addressed in term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nd in terms of the

airiti

emergence of a social structure dominated by the gentry class, very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attempted from a perspective that recognizes the linkage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gentry.

In light of the above, the present study proposes that any attempt to clarify the role play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regional identity as a factor i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a" in the Song Dynasty needs to consider the process by which people's sense of regional identity developed, and the related questions of memory. More specifically, there is a need for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records of local governance included in Song Dynasty local gazetteers (*difang zhi*) to explore how local identity and local governance evolved over time; it is hoped that the present study will serve to encourage more research in this area in the future.

Keywords: Song Dynasty, study review, region, local governance, argument of modernity, character of period